

■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宋元明清

巴蜀书社

译注 李永祐 郭成韬

审阅 刘烈茂

顾炎武
诗文选译



2 031 0330 0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顾炎武诗文选译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施 维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插 图：雷 鸣
郭海宁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顾炎武诗文选译

李永祐 郭成韬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150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7-30523-358-6/Z·28

定 价：140.00元 (第二批50种)

60510/20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难

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的人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清朝初年，集思想家、学问家、爱国诗人于一身的顾炎武，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颗巨星。

顾炎武（1613—1682），江南（今江苏省）昆山县人。初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更名炎武，号亭林。在清初流亡各地时，又曾署名顾圭年、蒋山佣。当时的学者多称他亭林先生。

顾炎武出身于江南世家大族。在幼年时，他的祖父就以关心国家大事、注意社会实际问题，对他进行教诲^①；刚进入中年，又接受了嗣母临终时“勿仕异朝”的遗训^②。先辈的言传身教，对他的

①《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

②顾炎武：《答次耕书》。

人生道路有深刻的影响。顾炎武的家乡，属于明无锡、苏州为中心的江南腹心地带，是明末爱国、正直的东林党人士的活动地区。顾炎武成年后参加的复社，则是继承了东林党人爱国、议政传统的文学社团。这个社团的广大成员，彼此以学问相砥砺，以气节相勸勉。在抗清斗争中，它的一批领袖人物和普通成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顾炎武从中受到鼓舞，汲取了精神力量。顾炎武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一个被称为“天崩地坼”（黄宗羲语）的剧烈动荡的时代。政治腐败、经济枯竭的明王朝，在农民大起义和清兵铁骑长期进击的双重打击下覆灭。清兵入关下江南对人民进行疯狂的屠杀和掠夺，种种严酷的现实，推动着顾炎武对社会问题进行反复思考，促使他走上了一条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诗歌创作紧密结合的独特道路，从而成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学问家和爱国诗人。

顺治元年（1644）清王朝建立之后，本已对科举八股取士制度极为厌恶的顾炎武，更绝意仕进，积极投身于江南苏州、昆山等地的抗清斗争。随着清王朝对江南加强统治，顾炎武在当地进行反清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因而他把目光转向了华北、西北地区。顺治十四年（1657）秋，顾炎武离江南北上。从这时起，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历

鲁、冀、辽、晋、陕、豫六省。所到之处，他一方面访问先朝遗老和爱国人士，密商抗清复明的大计，凭吊明朝陵墓和历代忠烈人物的遗迹，窥探清廷的虚实，观察用兵作战的地理形势，并在山东章丘县购置房舍田产，在山西雁门关造房垦荒，将这两处作为长期进行反清复明隐蔽斗争的活动据点。另一方面，顾炎武又随时注意调查各地的历史、文化、物产等实际状况，并与古人的记述相勘对。这种严谨、认真、踏实的治学态度，为他后半生撰写的大批政治、文史等论著，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顾炎武高深的学术造诣，为世人所敬佩，清朝统治者也把他视为笼络的对象。康熙十七年（1678）前后，一些人多次要推荐他应试博学鸿儒和参加纂修明史，但他坚定地表示：若以此事相逼，自己“非死即逃”，断然拒绝^①。他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操。顾炎武六十七岁时，定居于陕西华阴县，七十岁病逝于山西曲沃县。

顾炎武青少年时就有诗歌创作，但明亡之前的诗作没有保存下来，现存的三百余题、四百多首，全部是明亡以后的作品。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诗歌缺乏了解，主要是他的思想家、学问家的盛名掩盖了其

^①顾炎武《答次耕书》。

诗歌创作的成就。实际上，顾炎武的诗歌，不仅数量可观，在艺术上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其反映明末清初动乱的社会现实之深刻，展现爱国文人的精神面貌之真切，同时代的诗人是罕有其匹的。

顾炎武的诗歌注重描写国家民族兴亡的大事，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现存诗集的开篇之作《大行皇帝哀诗》，写的就是崇祯皇帝自缢、明朝覆灭的大事件。二十年后，作者游览骊山，触景生情，联系历史，写的《骊山》一诗，进一步提出“败亡未必皆荒淫”的看法，这种认识是他原先认真探索朝代兴亡原因的继续。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等几个抗清政权的成立，江南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清战争，在顾炎武的诗歌中都作了充分的反映。《感事》、《千里》、《秋山》等诗篇描写了江南军民举旗抗清的浩大声势和前仆后继、宁死不屈的战斗意志，揭露了清军残酷杀戮、焚烧造成的城邑残破、田园荒芜的惨状和清军劫掠美女财物的暴行。这些艺术地再现国家民族危亡年代大事件的诗篇，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前人评论顾诗如同评论杜（甫）诗一样，也称作“诗史”^①，如果把他的上述诗篇与他追述明朝兴起、发展的其他诗篇（如《帝京篇》、谒明孝陵、十三陵

^①顾云臣：《顾诗笺注序》。

等)合并起来看,他的诗的确犹如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年
的兴亡史。“诗史”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顾炎武的诗歌绝不是纯客观地反映现实,也不是空泛地表示褒贬。顾炎武信奉传统的“诗言志”的观点^①,所以他的诗歌无论各种题材都有着鲜明的爱憎倾向,而爱故国、爱民族,坚持反清复明大志的思想感情,则是鸣奏在他的诗歌中的主调。在抗清斗争的初期,诗人慷慨悲歌、投笔从戎,誓死报国的昂扬斗志和胜利信心,洋溢在字里行间。在抗清的主战场由江南转移到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后,诗人的心思时刻关注着远方战场的前途和命运。听到唐王在福州即帝位的消息(《闻诏》)、亲自接到唐王的御札(《李定自延平归贲至御札》),他感到如温暖的春风吹来,喜悦之情难以抑止,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在获知郑成功高举抗清义旗,连克东南沿海许多州县以及李定国大顺军与南明政权联合作战,出兵收复湖南大片土地的喜讯后,他欢欣鼓舞地庆幸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赋得秋鹰》、《传闻》)。当南国传来反正将领金声桓失败的消息后,他对抗清军的挫折深感痛惜,同时还精研兵书,认真思索和总结永历政权失利的原

^①《日知录》卷二十一“作诗之旨”。

因和教训（《春半》）。在《赋得越鸟朝南枝》中，诗人以“越鸟”自喻，表达了自己甘冒险阻、忍受摧残，也要“向阳”、“随日”的一片深情。最集中的表现出诗人这种坚贞不渝的深恋故国热诚的是《精卫》一诗，在诗中诗人以精卫自况，庄严地宣布：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正是这种为故国终生献身的精神，推动着诗人顶风雪、冒酷寒，遍历北方各省，进行深入隐蔽的反清活动；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在几个南明政权屡遭挫折以至最终失败后，诗人仍然信心常在，坚贞不屈，

合见文公还晋国，应随苏武入长安。

（《十九年元旦》）

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犹著花。

（《又酬傅处士次韵》）

直到逝世前两年，他在悼念亡妻的诗中，还自豪地吟咏：“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诗

人凛然的气节，一直坚持到最后一息。

与忠于故国民族的思想感情紧密相联，顾炎武有不少诗篇对抗清牺牲的志士和遇害的文人表达了深切悼念，对变节分子作了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鞭挞。诗人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描写了他的许多友人英勇献身的悲壮行为，表达了沉痛而又敬佩的心情。在《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诗中，对吴、潘二人因文字狱牵连惨遭杀害，表示了强烈愤慨和悲痛，对他们著书立说的成就和临危不苟的风范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晚年贫病而死的挚友归庄，诗人既刻划了他磊落孤高的个性，又突出歌颂了他一生坚持气节，宁肯贫贱自守，也决不为金钱禄位的诱惑而变节奉事新朝的高尚品质。对于变节败类，诗人则报以极端憎恶的感情。在《传闻》（其二）、《淄川行》中，诗人描写了听到孔有德、孙之獬被抗清军民处死的消息后喜悦振奋的心情，讽刺、嘲笑了他们可耻的下场。对于奉事新朝的文人，作者以“分题赋淫丽，角句争飞腾”痛斥他们苟且迎合，以求加官进爵的卑劣行为（《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以“蓟门朝士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生女须教出塞妆，生男要学鲜卑语”，揭露他们谄媚邀宠的丑恶心态。其语言之尖锐、锋利，真可谓达到了诛心砭骨的地步。

顾炎武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他从不写淡淡的哀愁，莫名的惆怅和泛泛的应酬之作。但他的创作题材也并不狭窄。他的诗还有一批描写交友、亲情和山水的作品。顾炎武敦重道义和友情，他与友人的赠答之作，总是坦诚相见，出语感人。《又酬傅处士次韵》，取譬设喻，对傅山进行委婉劝慰和热情激励，表现出君子之交以道义相砥砺的风范。与屈大均邂逅相逢，“何期绝塞千山外，幸有清樽十日留”的诗句，道出了有幸相会的欣喜眷恋之情（《屈山人大均自关中至》）。与程先贞重会，用“未论千里事，一见且衔杯”的诗句，写出了好友相见，摆脱常套所表现出的特有的亲热、豪爽气氛（《德州过程工部》）。而与好友李子德的相会，则通过描写眼神，将主客相互注视，彼此感到无限欣慰的情态和精神交流，表达得十分出色（《过李子德》其一）。《悼亡》诗是诗人仅有的一组描写夫妻之情的作品。诗中追忆新婚时白首偕老的誓言，回顾妻子支持自己从军杀敌、款待宾客的情景，联想自己久留他乡使妻子独居闺房的寂寞、清冷的心境，嘱托妻子告慰公姥于地下的话语等等，感情真挚，凄恻动人。在顾炎武的诗歌中，山水诗不多，但颇具特色。《金陵杂诗》其一，作者夜晚登楼眺望，不写满目万家灯火的景象，却从下楼后看到

“江空悬孤月”又回首窥望危楼下笔，构思新颖而隽永。《济南》一诗，借波光粼粼的水平衬托，将城外的山峰描绘成似出水芙蓉一般，亭亭而立，色彩艳丽、令人神往。《劳山歌》是一首描写山水景物的较长诗篇。诗中描绘了巍峨的山势，姿态各异的群峰，谧静的神仙洞府，刻画出了劳山高峻、幽静和奇异之美。

顾炎武的诗歌在艺术上也有相当高的成就。

首先，有鲜明的艺术风格。纵观顾炎武的全部诗歌可以看出，尽管其作品的风格在他的中年、老年不同时期有所差别，但雄放、凝炼、刚劲是最基本的特色。他的诗善于从大处落笔，描绘事物，表达感情。如“白羽出扬州，黄旗下石头。六双归雁落，千里射蛟浮。”（《京口即事》）“春风一夕动三山，使者持符出汉关。万里干戈传御札，十行书字识天颜。”（《李定自延平归 赍 至 御 札》）

“千里吴封大，三洲震泽通。”（《千里》）“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云海上生。”（《海上》其四）“劳山拔地九千丈，崔嵬势压齐之东。”（《劳山歌》）等等，都是高瞻远瞩、纵横自如地括概了时间和空间的大跨度，因而无论写时局、人心，还是大地山川，都开阔雄伟，具有一种雄放的气概。但诗人却并非刻意铺张扬厉，故作壮语。他笔下的

题材，都是经他精心选择，概括着现实和历史的实在内容，渗透着他对人生的体验，饱含着丰富而深沉的感情，并通过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因此诗歌的意蕴丰富而深厚。如《海上》其一写登临海边的感慨，把对现实苦难的悲伤，对南明政权的遥念和对它的前途的忧虑不安这样复杂的思想感情，浓缩在八句诗中，就表现出既雄放又凝炼的特点。刚劲是顾炎武诗歌风的又一特色。顾炎武壮年时期的诗歌，就具有一种慷慨悲歌的阳刚之气，在经历抗清战争和走南闯北，饱尝人间艰难辛酸之后，更加百折不回，坚韧不屈。诗人把自己比喻作“立雪凌寒”的柑桔（《颜神山中见桔》），能经受任何风霜的摧残。与人谈到自己的个性时，曾申述说：

“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一种刚劲凛然的气慨充溢于诗中。清人沈德潜称赞顾诗“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①。顾炎武自己也主张：“诗主性情，不贵奇巧”^②，他的诗的风格就是他的性情的艺术体现。

顾诗在以雄放、凝炼、刚劲为基本风格的同时，又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如《淄川行》浅近、明快，富有民歌风味。《桃叶歌》在轻柔、舒缓的

①《明诗别裁》卷十一。

②《日知录》卷二十一“古人用韵”。